

国家安全环境的系统理论

唐世平

【内容提要】国家能否制定相对正确的安全大战略取决于国家能否对其安全环境有尽可能准确的判断。国家安全环境是一个系统,因此,评估国家安全环境也必须采用系统的方法。本文阐述了决定国家安全环境的主要因素,以及各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初步建立了一个国家安全环境的系统理论。

【关键词】国家安全;安全环境;系统性

【作者简介】唐世平,1967年1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分子生物学博士,国际关系硕士。(北京 邮编:100007)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1)08-0016-06

一 理解国家安全环境: 系统方法的必要性

作为主导国际政治理论及实践的思想,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一是“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理论。^①“理性选择”理论假定一个有思想的主体会根据其对战略环境的判断,选择其认为是最佳的行动。这就意味着,国家能否对其安全环境有尽可能准确的判断决定了国家能否制定相对正确的安全大战略。

如果把国家比做一个生命体的话,那国家的安全环境就如生命体的生态环境,是一个系统。^②在一个系统内,任何单个的刺激都将通过系统而产生无法单独估计的影响。即,安全环境中的某一个环节上的变化必然影响另外的环节。一个事件对安全环境的影响也不能被孤立地评估。

因此,评价国家安全环境必须采用系统的方法。传统的就事论事无法真正地理解国家安全环境,它充其量只能为应付突发事件提供一些参考,却无法为制定长远的安全大战略提供帮助。

遗憾的是评估国家安全环境的系统理论并不存在。理论匮乏的后果是许多安全问题研究都只把握一两个因素,过分强调一些因素或事件而忽视另外一些

因素或事件。人们讨论安全环境时,经常只以某一个因素为依据,或罗列一些因素,却不深究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这样的非系统方法无法准确地评估安全环境,进而导致国家安全政策的失误,反过来引起不利于国家安全环境的反应。

因此,要想制定正确的安全大战略,必须建立一个国家安全环境的系统分析框架。

二 安全环境的决定性因素

安全环境的系统理论必须先找出影响安全环境的主要因素(这些因素必须是相对独立的变量),然后阐明这些决定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规律。

一个因素要想影响一个国家的安全环境,必须能超越地理环境的屏障(即使是邻国也有山川河流相隔),所以,地理环境本身和能超越地理屏障的技术(大

① 对现实主义的核心假设的阐述,见 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2 (Fall 1999), pp. 5~55.

② 这里的系统的定义是,满足以下两点的一些个体的组合构成一个系统:A) 一个个体的变化引起其他个体的变化;B) 一个变化会引发一些“不可预见”的变化。Robert Jervis, *System Effects: 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6. 国际政治的系统学派,当推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ddison-Wesley, 1979)。

多时候是军事技术)都是影响国家安全环境的重要因素。^①

一个国家的强大也许并没有威胁别国,但别国仍会感到不安而采取一些敌意的政策,反过来使第一个国家采取反对策,其结果是两国的安全环境都恶化了。这种一国的发展与政策和他国的发展与政策的相互作用(以下简称“国家间相互作用”)是影响国家的安全环境的重要因素。^②

尽管国际结构不能决定国家所有的政策,^③但国家的安全政策(比如联盟政策)强烈地受到国际结构的制约和影响。^④如两极结构下,处在“极”的国家无法“推卸责任”,因而经常被它们的盟国利用。^⑤而多极结构下,处在“极”的国家既可能希望让盟国付出和敌人较量的代价,自己坐收渔人之利;也有可能认为被各个击破的危险太大而被盟国拖入战争的泥潭。^⑥总之,国家在不同国际结构下会有不同的行为,而这些行为的相互作用将影响各自的安全环境。因此,国际结构也是影响安全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

最后,国家从未是惟一能影响安全环境的角色,自然灾害和其他因素无时不在影响安全环境(比如瘟疫是导致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⑦)。因为传统的安全概念是指国家行为对安全造成的影响,本文将这些影响安全环境的非国家行为(可以是军事和非军事的)定义为“非传统安全因素”。^⑧这些“非传统安全因素”正对国家的安全环境产生日益广泛的影响,一些非传统安全威胁(如民族分裂主义)也可以转变成传统意义上的安全威胁。

因此,决定国家安全环境的主要因素有五:地理环境、“国家间相互作用”、国际结构、军事技术的发展、非传统安全因素。

以下分别予以论述。

(一) 地理环境因素

其他影响安全环境的因素都是试图超越地理因素的限制而影响安全环境,而这些因素(比如国际系统的结构性变化)在多数情况下无法超越地理障碍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地理环境因素是决定国家安全环境的最重要因素:如同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物的生存大环境一样,国家所处的地理环境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生存大环境。

人类历史上,70%的陆地从未见过大规模战争,而欧亚大陆中心的 Adrianople(今土耳其 Edirne)却在公

元 323~1913 年间经历了 15 次大规模的战役。^⑨可见,人类所争夺的必定是能争夺和值得争夺的地方,人类形成的国家也注定是地理的奴隶。

不管世界是几极,中国的安全环境都不可能比美国的好。美国的两边是广袤的海洋,上下是两个弱小的邻国;而和中国接壤的国家就多达 14 个,邻国就更多。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中国追求霸权就多半会引起周边国家联合起来一起对付中国。因此新中国“永不称霸”的外交纲领不仅反映了中国安全战略的道义感,也反映了新中国历代领导人对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的深刻理解。

但是,地理环境的屏护因受到其他因素的冲击,不是永恒不变的。^⑩

(二) 国家间相互作用

一个国家既是其本身安全环境的消费者,又是本身安全环境的创造者。国家的发展和政策不仅从主观上改变了其本身的安全环境,而且也将客观地改变其他国家的安全环境。这些国家对安全环境变化的反应又将反过来影响第一个国家的安全环境。因此,影响安全环境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国家间相互作用。

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实质上无法分开,国内政治的压力常常使决策者改变国家的安全政策,而最终影响安全环境。国家安全环境决不是纯粹由外界因素造

① 本文用“地理环境因素”,而不是被滥用的“地缘政治因素”来描述安全环境的最重要决定因素。“地缘政治因素”实质上是几个因素的叠加(至少是本文第一和第二个因素的叠加)。叠加的概念会给系统分析带来许多困扰。

② 这是“安全困境”理论的出发点,见 John Herz,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ts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WP), Vol. 2 (January 1950), pp. 157~180;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P, Vol. 30 (January 1978), pp. 189~214, pp. 497~538; Charles L. Glaser, “The Security Dilemma Revisited,” WP, Vol. 50 (October 1997), pp. 171~201.

③ 按 Waltz 的说法,国际结构决定一些“大而重要的问题,但不是所有的问题”。Kenneth N. Waltz, “Reflection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Response to My Critics,”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329.

④ Jervis, *System Effects*, pp. 197~209.

⑤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204~209.

⑥ Thomas J. Christensen and Jack Snyder, “Chain Gangs and Passed Bucks: Predicting Alliance Patterns in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4, No. 2 (1990), pp. 137~168; Glenn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P, 36 (July 1984), pp. 461~95.

⑦ 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见休昔底德的不朽经典: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Rex Warner tran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2)。

⑧ 一种意见认为“非传统安全因素”是“非军事因素”,另一种则认为是“非国家因素”。作者认为第二种定义更加符合实际,比如恐怖活动显然是军事性的,但恐怕很难将其列入传统安全因素。见:张蕴岭《综合安全观及对我国安全的思考》,载《当代亚太》,2000 年第 1 期,第 4~6 页。

⑨ John Keegan, *A History of Warfare* (New York, N. Y.: Vintage Books, 1993), pp. 68~70.

⑩ 比如海洋曾是国家最好的屏障,但远洋航行出现后,其保护作用就大大降低。

成的,而是和国家本身的发展和政策紧密相关。^①

国家安全是建立在国家间相互作用上意味着国家安全是相互依赖的和相对的。国家的安全不可能建立在单一地追求本身的安全上,它只能建立在国家间的动态相互作用上。任何片面地追求本身的安全,特别是“绝对安全”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这只能建立在完全征服其他国家的基础上。

(三) 国际结构

一国在国际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将决定其大的行为准则,而国家行为又通过国家间相互作用来影响安全环境,因此国际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安全环境。

但不同国家在同样国际结构下的安全环境并不一样。如古巴的安全环境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恶化了,尼泊尔和不丹的安全环境则没有多大变化。同样的国际结构也并不意味着任何一个地区或是国家面临同样的地区结构(或“亚结构”)。蒙古面临的地区结构仍是中俄两极,而加勒比海则始终处在单极世界中。

国际结构对安全环境的影响受其他因素的制约还可以用历史上曾有过的两个“两极世界”的结局很好地说明:斯巴达和雅典之间,古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两极世界”,远不像沃尔兹(Waltz)所说的那样风平浪静,^②而都以战争结束。

总之,国际结构对国家安全环境的左右程度并不像许多人想象得那么高。国际结构是相对稳定的,而国家安全环境则建立在国家间相互作用之上而始终处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

(四) 军事技术的发展

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军事革命都带来一种新的战争模式。从以石为主的防御堡垒、到战车和马成为战争的武器、到火药的广泛运用、到核武器的出现,国家对战争的计算和态度都随之而改变,因而改变了国家的安全环境。

军事技术还通过超越地理屏障来改变国家的安全环境。航海技术完善之前,中国面临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北方;而航海技术出现后,中国就同时面临来自欧洲、日本和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飞行技术大大缩短了地理距离,而战略核导弹更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安全环境:核国家之间的安全不再是基于能在战场上赢得胜利,而是基于“绝对相互摧毁能力(MAD)”。^③一个国家的安全从此真正成了别国手中的人质:一国的安全从

此必须依赖于另一国的安全。

当进攻压倒防御时,安全困境就恶化,国家之间的不信任感加剧,而先发制人的战争可能性就增大,战争变得相对便宜,因而更加容易爆发,国家的安全环境也因此而恶化。^④秦始皇统一中国,进攻手段的完善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坦克的出现则使希特勒的闪电战得以席卷欧洲大陆;对进攻的盲目崇拜是欧洲大陆最终爆发一战的重要原因。^⑤

因此,美国和日本要发展的导弹防御系统是能使国际安全环境发生结构性恶化的最危险因素。导弹防御系统将从根本上动摇二战以来的国家安全理念:即国家的安全是基于相互依赖和相互阻吓(威慑)上的相对安全。^⑥

科索沃战争使中国的安全环境恶化了,不仅是因为主权受到挑战和民族分裂主义受到纵容,也因为科索沃战争显示了精确制导武器的完善,在常规战场上,进攻又一次压倒了防御。如同核武器的到来一样,精确制导武器的完善意味着在常规战争中阻吓和防守的分离。^⑦在此之前,一国即便不能主动对另一国造成多少伤害,却仍可以用在战场上的寸土必争而阻吓敌人的侵略(或是压力)。在精确制导武器的时代,双方并不在战场上真正接触,如果强大的一方不想占据弱国的领土,抗拒性的阻吓战略(deterrence by denial)将无法阻吓强大的一方只想迫使另一方就范的战略。^⑧

信息战的到来也将使安全困境恶化。信息战中,进攻和防御的手段几乎无法区分,速度也远远超过以往所有的军事力量延伸,地理的距离变得毫无意义,偷

① “新古典现实主义(Neoclassical Realism)”。见: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P, Vol. 51 (October 1998), pp. 144~172.

② Kenneth N. Waltz, “The Stability of Bipolarity”, Daedalus, Vol. 93, No. 3 (Summer 1964), pp. 881~901;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apter 8 & pp. 204~205.

③ Robert Jervis, The Meaning of Nuclear Revolution: Statecraft and the Prospect of Armagedd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Chapter 3.

④ Stephen Van Evera, “Offense, Defense, and the Causes of War”, IS, Vol. 22 (Winter 1997/1998), pp. 5~43.

⑤ Jack L. Snyder, The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Military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Disasters of 1914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Stephen Van Evera, “The Cult of the Offensive and the Origin of the First World War”, IS, Vol. 9, No. 1, (Summer 1984), pp. 58~107.

⑥ “阻吓”在我国又被称为“威慑”,但“阻吓”可能更贴切些。

⑦ Robert Powell, Nuclear Deterrence: the Search for Credibi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Chapter 3. 对精确制导武器影响的早期探讨,见 John J. Mearsheimer,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Chapter 7. Mearsheimer 当时认为精确制导武器更利于防守方,而我认为如今的精确制导武器更利于进攻一方,因此,安全困境将恶化。

⑧ 唐世平:《TMD 和科索沃之后的中国军事战略选择》,载《当代亚太》,1999 第 10 期,第 25~30 页。

袭的机会大大增加,安全困境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在诸多进攻压倒防御的因素下,恐怕惟一能让人类“庆幸”的是,在导弹防御系统不完善时,大国之间仍存在的核威慑能够在相当程度缓解常规战场上的安全困境。因此,在充分估计军事新技术对国家安全环境的冲击时,不能过高地估计科索沃战争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

(五) 非传统安全因素

“非传统安全因素”对国家安全环境的影响事实上很早以前就存在,其影响的凸显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各国间相互依存越来越深化的结果。^①但其对安全环境的影响一般不可能超过传统安全因素。^②这是因为抵御非传统安全威胁最主要的力量仍然是国家能力或国家能力的合作。只要国家机器能有效地凝聚力量,赢得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抵御绝大部分非传统安全威胁。^③另外,非传统安全因素对安全环境的影响也受到地理因素和其他因素的限制(如亚洲金融危机的波及范围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

三 评估国家安全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

安全环境的系统性意味着国家安全环境的系统理论必须对上述五个因素的相互作用规律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一) 相互作用的规律 A:演绎和判定框架

国家的地理环境是相对稳定的,因此可以把地理环境因素视为一个半变量。但即便如此,影响国家安全环境的还有其他四个变量,而变量间的相互作用又难以把握,所以,要给出一个评估公式是不可能的。但一个评估国家安全环境的大体范式(paradigm)将有助于人们理解和评估安全环境。为此,这里首先确定衡量各个变量的尺度。

一个国家的地理环境对国家安全环境的影响可以用国家地理屏障的可渗透性(permeability)来衡量:可渗透性越低,屏障的保护作用越大,国家安全环境越好,国家对环境变化的敏感度(sensitivity)和脆弱度(vulnerability)越低。^④敏感度越低意味着国家越不易对环境变化作出反应,国家政策会相对稳健。脆弱度越低则意味着国家即使一时不对环境变化作出反应,面临的危险也较小。相反,地理环境的可渗透性越高,安全环境就越脆弱。

国家间的相互作用对安全环境的影响从两个方面衡量:(1)国家越理解安全困境的存在,国家的政策就越会有意识地去塑造或维持良好的安全环境,因而安全环境越好;(2)国家越强大,对环境变化的脆弱性就越低,安全环境也越好。当然,许多时候,在力量发展和降低安全困境之间寻找平衡往往是困难的。

各种试图证明哪一种结构更和平的尝试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因此,我们在衡量国际结构对安全环境的影响时,将不以国际结构本身来衡量(比如单极/两极/多极)。我们认为国际结构对国家安全环境影响主要取决于国际结构能否对潜在的威胁保持一种制衡:制衡作用越强,安全环境就越好。

军事技术对安全环境的影响可以直接用防御/进攻平衡来衡量:对防御有利,安全环境越好。这一结论即便在决策者对防御/进攻平衡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时候也仍然成立。^⑤

非传统安全因素对安全环境的影响可以由其转变成传统安全的可能性大小来衡量:其转变成传统安全的可能性越大,对安全环境的影响越大,反之亦然。

上述的论述可以写成表一。

表一 影响安全环境因素的衡量尺度

地理环境的可渗透性	高——低
国家间的相互作用: 对安全困境的理解	低——高
国家间的相互作用: 国家的发展	弱——强
国际结构的制衡力	弱——强
军事技术的防御/进攻平衡	进攻优势——防御优势
非传统安全转换成 传统安全的可能性	大——小
国家安全环境	坏——好

(二) 相互作用的规律 B:实证

上述五个因素反映了国家安全环境的多面性,而

①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39 ~ 146;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Boston, M. A.: Little & Brown, 1977), pp. 8 ~ 19.

② 类似的观点,见阎学通:《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分析与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 年第 2 期,第 9 页。

③ 东南亚金融危机充分证明一个健全的国家机器有能力面对非传统安全因素带来的威胁。

④ 这里的讨论受到 Waltz 以及 Keohane/ Nye 对相互依赖中的 sensitivity 和 vulnerability 的讨论启发。见: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39 ~ 146; Keohane and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pp. 8 ~ 19.

⑤ 因为防御有利时,一个国家遭到进攻后生存的希望更大。

被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所侧重。^①因此,如何把各个因素有机地联系起来并指出它们间的相互作用规律,就是发展国家安全环境系统理论的难点。

笔者认为,“安全困境”理论为这一点提供了理论基础,因为“安全困境”能有机地将五个因素联系起来,便于理解因素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后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最终影响。

首先,地理环境对安全环境的影响是通过“安全困境”来起作用的。比如邻国经常是对一国威胁最大的国家,但如果两个邻国间有高山或大海相隔,对彼此的威胁就会比它们之间是一马平川相连要缓和。地理环境的不同还将导致国家的政策有所不同,因而也最终影响国家的安全环境。比如,中国和印度间因为有喜马拉雅山脉,安全困境不是无法忍受的,因而中印达成战略和解的机会反而减少了。

国家间相互作用通过“安全困境”而影响安全环境则更显而易见:一个面临“围堵”的国家和一个周边国家都友好的国家的安全环境会有巨大的差别。国家的发展还通过改变国家力量的对比从而影响国际结构和国家的行为而影响安全环境。

国际结构对安全环境的影响也通过安全困境起作用。事实上,“安全困境”的存在就是源于国际结构的无政府状态。^②

军事技术的进步会超越地理因素对安全环境的限制,从而缓解或是加剧安全困境。此外,军事技术的进步还可以通过改变国家力量的对比,继而通过影响国际结构和国家行为而影响安全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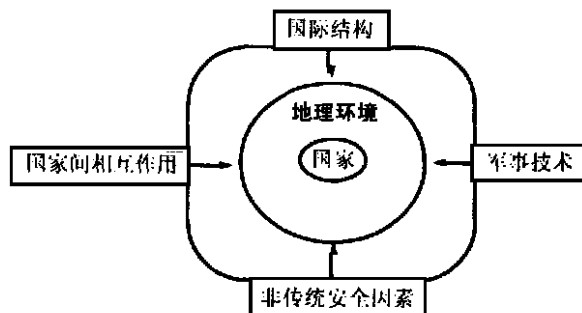
最后,非传统安全因素也通过安全困境起作用。冷战后,相互依赖程度的增加使非传统安全威胁传播更加快速(比如金融危机、流行病等),这种威胁传播快速带来的安全困境加剧又让各国意识到合作的必要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传统意义上的安全困境。

东南亚金融危机对印度尼西亚的冲击是另一个多个因素的相互作用最终导致国家安全环境变化的例子。印尼离危机的起点(泰国)近,和东南亚国家经济相互依赖深入而广泛,其国家机器相对脆弱,因而遭受严重打击。金融危机的冲击又最后导致东帝汶事件,非传统安全问题最终演变成传统安全问题。

综合起来,可以将影响安全环境的五个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规律概括成四点:(1)一个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生存大环境,因而是安全环境的最重要

决定因素。(2)其他因素,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无法超越地理屏障的决定性力量。但在一定情况下,一个因素或几个因素的结合可能会超越地理屏障,极大地改变国家的安全环境。(3)国家既是安全环境的使用者,也是安全环境的塑造者。因此,一国的发展及政策和他国的发展及政策一样都能影响其安全环境。(4)因素的相互作用不一定直接改变一个国家的安全环境,也有可能是先改变一国的安全政策,而后改变他国的安全政策,之后反过来改变该国的安全环境。安全政策的改变也并不一定是由于安全环境真的发生了大的变化,而是因为对安全环境的判断发生了变化。这些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和最终对安全环境的影响可以用图一来简略表示。

图一 国家安全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



(三) 相互作用:安全环境系统的脆弱性和稳定性
用安全困境理论来理解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得出一个看似矛盾的结论:即国家安全环境作为一个系统,既是脆弱的又是相对稳定的。

安全环境是脆弱的,首先是因为许多因素都能影响安全环境,而安全环境的系统性有可能使得一个看似小的变化对安全环境产生极大的影响。说安全环境是脆弱的还因为许多因素都会使安全环境变化,而一旦国家做出使安全环境恶化的举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别的国家就会(或只好)采取应对的措施。其结果是安全困境螺旋上升,所有国家的安全环境都最终恶化。

安全环境是相对稳定的,是因为安全环境作为一个系统,有其系统的惯性。在系统内,一个因素或特定的发展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难以单独深刻地改变国

^① 现实主义关心地理环境(或地缘政治)和军事技术,新现实主义强调国际结构,新自由主义则注重非传统安全因素。

^② Glaser, "The Security Dilemma Revisited".

家的安全环境。因此,一个看似严重的危机对国家安全环境的影响也许并非人们想象得那么大。^①

说安全环境是相对稳定的还因为国家既是安全环境的消费者,又是安全环境的塑造者。因此,国家对其安全环境有相当的控制能力,即国家有多种方式可以谋求自身安全环境的改善。首先,国家可以通过发展威慑能力,使那些想对自己构成威胁的对手在威慑能力面前放弃原来的打算。其次,国家可以通过联盟,谋求一定意义上的力量平衡或威胁平衡来改善自身的安全环境。再者,国家可以通过新的安全合作(比如建立信任措施、多边安全合作等)来降低安全困境带来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合作各方的安全环境都因此而改善。中国和俄罗斯通过吸取中苏相互敌视而付出巨大代价的历史教训,致力于改善关系并最终形成战略伙伴关系,大大改善了彼此的安全环境就是这样的例子。

四 理论框架的意义

(一) 实践意义

对安全环境的判断是国家制定安全大战略的基础,而国家的安全政策又会反过来通过国家间相互作用而影响国家的安全环境。因此,一个国家能否对安全环境有相对全面和准确的评估就对其安全环境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如何理解安全环境对安全环境有重大影响。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国家都是以“粗糙”的现实主义来理解安全,对安全的理解往往都只追求军事力量和征服。欧洲各国和日本在二战前都以蒙上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科学”光环的地缘政治眼光来理解安全,一心追求“生存空间”,对人类文明造成的灾难是众所周知的。因此,人类对国家安全的系统性缺乏理解并不意味着系统作用的消失,无视其存在只能给人类带来噩运。

要想缓和国家安全困境,国家必须接受安全只能是相对的这一理念。安全的相对性和相互依赖性使得国家确实可以通过谋求别国的安全而反过来让自己更安全。中、俄、哈、吉、塔五国在上海达成的协议就是这样的例子:各国不追求狭义的自身安全,而是追求共同安全下的自身安全的增加,从而使五国的安全都增加了。

因此,要使国际安全环境保持一个相对好的状态,

需要各国(特别是大国)在制定安全政策时,充分考虑到安全困境的作用。只要国际结构还是处在无政府状态下,人类就永远也无法消除安全困境,而只能设法去缓和和安全困境。

安全环境的系统性意味着国家的安全环境绝不是纯粹由外部因素构成的。认为安全环境纯粹是外部因素造成的很容易导致用寻找威胁的方法去理解安全环境。但威胁分析无法全面地理解安全环境,极易陷入就事论事而无法完整地把握国家的安全环境。更可怕的是,威胁分析很容易夸大某一事件的影响,引起过激的反应,进一步导致安全环境的恶化。

安全环境的系统性意味着国家的安全政策选择具有不兼容性和不可逆性。国家在选择某一种政策时,也就限制了其他选择的可能(可能是无意的)。其原因在于几种选择本身是相互矛盾的或是某一种政策产生的后果使得第二个政策变得不可能。而一旦发现选择的政策行不通时,想再回到起初的政策选择点也已经不可能。

安全环境的系统性还意味着国家安全政策的后果绝大多数时候是不可能被孤立地评判的。这是因为系统内的任何一点的变化都有可能引起其他点的变化,甚至引起整个系统的变化。因此,在制定安全政策时,必须考虑不同政策的相互作用,即安全政策的互动性。

用系统的观点分析安全环境还意味着国家的安全政策或一个双边关系都受到其他国家的安全政策和其他国家关系的影响。因此,研究一个国家的安全政策或两个国家的双边关系时,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将一个国家的安全政策或一个双边关系相对割裂地研究仅仅是为了便于研究,而不是现实。

(二) 理论意义

对安全环境的判断和预测是国家安全政策的基础,缺乏一个评估安全环境的系统理论使学者们和决策者对安全环境的不同判断无法在同一平台上相互沟通。于是,很多对国家安全环境和政策的争论基本上只是基于直觉的争论。

这里发展的理论框架为讨论安全环境提供了一个初步的平台。首先,作者将原本看似联系并不一目了然的影响安全环境的五个因素首次用系统的方法有机

^① 比如,我国的国力和核威慑使得美国和北约要想武力干涉中国内政必须冒巨大的风险,因此科索沃战争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不应被高估。

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与东亚安全

丁 奎 松

【内容提要】小布什入主白宫后,中美双边关系因撞机等一系列事件而日趋紧张,同时,美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大体思路亦凸显出来。近来,美国内政治气氛向右转,对华政策评估趋于严峻,故在东亚地区实行“预防性防御”,企图不战而屈人之兵。小布什政府以“政治安全领域竞争、经贸领域合作”为中美关系定位已日益明显。其谋求打破上届政府对华全面接触政策的基本框架:在中美双边关系上,实现政经脱钩的双轨制;在对台关系上,探求使由美国主导的政策清晰化;在强化美亚太战略优势的同时,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这种政策调整的恶果势将影响东亚的和平与稳定。鉴此,东亚国家实际上面临三种选择:一是听任美国以实力外交加剧紧张局势,重复冷战的历史;二是容忍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谋求逐渐包容美国;三是调整思路,扎实探索东亚区域政治安全合作,由东亚国家决定自己的命运。第三种选择值得所有东亚国家认真思考。

【关键词】美国;布什政府;对华政策;东亚安全

【作者简介】丁奎松,改革开放论坛副理事长,研究员。(北京 邮编:100010)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1)08-0022-04

最近的中美撞机事件、美国宣布向台湾出售 40 亿

美元的武器系统、布什总统关于“保卫台湾”的讲话以

地联系起来。作者首先指出了影响安全环境的五个因素,然后阐明了其相互作用的大体规律。五个因素反映了安全环境的多面性,而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则体现了安全环境的系统性。

其次,本文提出的安全环境的系统理论将是真正意义上的“综合安全观”,因为这里对安全环境的判断将是基于对影响安全环境的主要因素和因素间相互作用分析后作出的相对全面和系统的判断。

最后,用系统的眼光来理解国家的安全环境意味着原来势不两立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并不是矛盾的,而是互存的:一个国家确实可以通过让别的国家更安全而达到自身的安全。当所有国家都对其安全环境有相对全面和准确的评价时,国家间的政治将变得不再那么危险。^①

对安全环境的评估受到意识形态、历史经验、个人经历、个性、官僚机构的内耗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国家无法绝对“理性”和“准确”地理解安全环境。但如果我们希望人类的未来会比过去的千年更加好的话,我们必须希望政治家们能在“有限理性”的范围内尽量以更加系统和全面的眼光看待他们面对的世界,从而制定更加理性的安全政策。从这一点上来说,世界和平的确有赖于更加完善的安全理论系统和思想。

[收稿日期:2000-10-10;修回日期:2001-01-11]

[责任编辑:邵 峰]

① 这可以说是建构主义的理想目的。关于建构主义,见:Alex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Spring 1992), pp. 391~425.